

「詩窮而後工」的歷史考察

鞏 本 棟*

摘 要

「詩窮而後工」是中國古典詩學的重要命題之一，其說雖淵源有自，然明確提出此說的，則是北宋的歐陽修，而這又與北宋黨爭有著密切的聯繫，是北宋黨爭背景下的產物。在歐陽修之後，此說成爲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題「詩能窮人」以及後者的反命題「詩能達人」等觀點的出現。

關鍵詞：「詩窮而後工」、黨爭、北宋、歐陽修、梅堯臣

*南京大學中文系暨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教授

A Historical Study of “*Shi Qiong er Hou Gong*”

Bendong Gong*

Abstract

“*Shi qiong er hou gong*” (If one is in a poor situation, one will become skilled in writing poetry.)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 idea can be traced back to earlier periods, but it was first presented by Ouyang Xiu, and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factional strif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fter this, it became a general viewpoint, and from this emerged the ideas that poetry can impoverish people or help people achieve immortality.

Key words: “*Shi qiong er hou gong*”, factional strif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uyang Xiu, Mei Yaochen

*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詩窮而後工」說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理論命題之一，其說的提出，既有文學自身發展的因素，也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和背景，追尋這些原因和背景，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理解「詩窮而後工」說及其它相關的文學理論和觀念，無疑都有十分積極的意義。¹

壹

「詩窮而後工」說的源頭，我們可以追溯得很遠。孟子說：「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²這裏雖還只是泛論道德心志，然無疑已啓後人發憤著書之旨。³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¹ 關於「詩窮而後工」的問題，此前學術界亦有討論，如張健先生所撰，《歐陽修之詩文及文學評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5年），即認為「詩窮而後工」的問題，「自宋初歐陽修主倡以來，應和者不絕於途」，「如梅堯臣、張耒、曾鞏、王安石、蘇舜欽諸人，都是歐陽修的呼應者。但仔細的觀察，這種說法自唐人白居易〈與元九書〉以來，素有二流裔：一為詩能窮人；一為人窮而後詩工。陳師道頗有意於另闢蹊徑，但實際上也未能脫出這個大範圍」（《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頁243）。已注意到「詩窮而後工」與其逆命題「詩能窮人」的問題，足資參考，然張先生尚未論及此說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和原因等問題。

² 《孟子》〈盡心上〉，見宋·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3，頁353-354。

³ 錢鍾書先生已指出此點，參其《管錘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冊3，頁936。

⁴同樣的意思，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其所以反復發為此論，無疑主要是緣於遭遇李陵之禍、「身毀不用」的嚴酷現實。所謂發憤著書，是因為不得志，故抒其憤懣，「思垂空文以自見」，即著書以見其志。不過，這裏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的思想基礎，顯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觀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爲其所追求的目標。所以，發憤與著書之內容的關係，少有涉及。

到了唐代，韓愈在爲裴均、楊憑所作的〈荊潭唱和詩序〉中論道：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仆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閭里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⁵

這裏固然有受司馬遷發憤著書說影響的因素，但韓愈所論的角度卻有不同。他更多地強調了著書的內容，即「易好」的是「窮苦之言」，而非「歡愉之辭」。不過，之所以「窮苦之言易好」，似乎並非因爲發憤，而主要是「韋布里閭憔悴」之士往往能夠「專一」於創作的緣故，所以，發爲詩歌才能「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即使達官顯宦如裴均、楊憑，只要「能存志乎詩書」，也是可以「與韋布閭里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的。至於因窮愁而發憤著書這一面，韓愈僅在〈送孟東野序〉中有所論述。其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

⁴ 南朝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41，頁1864、1865。

⁵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4，頁262-263。

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⁶這裏的「物不得其平則鳴」，便有發憤著書的意思。然而，這話說得也很寬泛，凡為外物所動，有所感發，作詩撰文等等，都屬於不平之「鳴」。因為「善鳴」者既可以「自鳴其不幸」，也是可以「鳴國家之盛」的。⁷韓愈在送孟郊前往溧陽任職時說這話，自然是勸他的朋友不必以外任縣尉為意，誰能說這就一定是壞事、一定不可以「鳴國家之盛」呢？

自然，在中國文學史上，明確提出「詩窮而後工」說的，是歐陽修。其〈梅聖俞詩集序〉曰：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

⁶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卷4，頁233。

⁷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卷4，頁235。

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⁸

在〈梅聖俞墓誌銘序〉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

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讖笑謔，一發於時，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略)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⁹

從司馬遷的發憤著書之說，到韓愈的志存詩書、搜奇抉怪和不平之鳴的議論，再到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的觀點，人們對問題的認識無疑更進了一步。因為在歐陽修看來，詩所以能「窮者而後工」，不僅在於窮者能專一於文學創作和搜奇抉怪，更在於其在政治上既然不得志，不免「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於是「興於怨刺」，「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窮而專一精思，窮而「感激發憤」、「興於怨刺」，文學創作上才會有成就。這就是歐陽修「詩窮而後工」論的內涵。在這裏，「詩窮而後工」與「詩可以怨」首次明確地聯繫在了一起。¹⁰

歐陽修晚年還曾對這一問題作過解釋，不過，其看法反而顯得有些退縮了。他說：「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¹¹這裏雖談到「感激發憤」，卻並未再強調「興於怨刺」與「道羈臣、寡

⁸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卷716，冊17，頁425、426。

⁹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755，冊18，頁93、94。

¹⁰ 關於「詩可以怨」，錢鍾書先生曾有專文論述，見其《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01，此不贅。

¹¹ 北宋·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717，冊17

婦之所歎」這一層。個中原因何在呢？

細加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歐陽修的上述兩處議論，都並非泛泛而談，而是有其具體指向的，那就是皆為梅堯臣而發。我們再看他的幾首贈梅堯臣的詩，就更明白了。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文辭愈清新，心意雖老大。(略)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¹²

〈讀聖俞蟠桃詩寄子美〉：「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略)孟窮苦累累，韓窮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略)郊死不為鳥，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窗。霜寒入毛骨，清響哀愈長。玉山禾難熟，終歲苦饑腸。」¹³

〈寄聖俞〉：「凌晨有客至自西，為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朝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虹霓。空腸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身事拙，捷徑恥蹈行非迷。」¹⁴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君老忘卑窮，文字或綴緝。(略)誰云已老矣，意氣何業岌。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帶。」¹⁵

一方面以孟郊比梅堯臣，極言其「窮」，並對其有志而不得伸展的遭遇深致慨歎；¹⁶另一方面則極力稱賞其作詩能「披霜掇孤英，泣古弔荒塚。琅

，頁 439。

¹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卷 283，冊 6，頁 3596。

¹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283，冊 6，頁 3602。

¹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286，冊 6，頁 3626。

¹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285，冊 6，頁 3615、3616。

¹⁶ 而且是既「窮」且貧，如歐陽修又有詩道：「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雞。兒啼妻噤午未飯，得米寧擇糝與糠。」（〈答聖俞〉，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286，

玕叩金石，清響聽生悚」。¹⁷「窮」似乎與梅堯臣這位被宋人譽為本朝詩開山祖師的人物¹⁸，有著難解之緣。

貳

梅堯臣一生仕宦不顯。他年輕時曾多次應進士試，均不中，二十六歲左右，以叔父梅詢門蔭補太廟齋郎，任桐城縣主簿。其後輾轉於河南、河陽主簿，建德、襄城知縣、監湖州鹽稅，簽書許州、陳州判官。直到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梅堯臣方被召試學士院，賜同進士出身，改太常博士，次年監永濟倉。嘉祐元年（1056），翰林學士趙槩與歐陽修等薦其補國子直講，嘉祐五年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同年卒。

對梅堯臣長期困於州縣的原因，歐陽修曾為我們提供過一個尋繹的線索。慶曆元年（1041），梅堯臣將赴湖州監鹽稅，歐陽修置酒相送，並作〈聖俞會飲〉詩，詩中說道：「吾交豪俊天下選，誰得衆美如君兼。（略）關西幕府不能聘，隴山敗將死可慚。嗟餘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¹⁹何以「關西幕府不能聘」？又何以「嗟餘身賤不敢薦」？當我們對慶曆及其前後的歷史進程，尤其是對發生在統治階層內部的那場激烈的思想政治鬥爭——慶曆黨爭作了比較深入的瞭解之後，我們會發現，梅堯臣在慶曆黨爭中所處的位置，實際上不屬於新、舊任何一派，這種依違於新、舊兩黨之間的尷尬狀態，最終決定了他窮困不遇的命運。

冊 6，頁 3627）。

¹⁷ 北宋·歐陽修，〈秋懷二首寄聖俞〉其二，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284，冊 6，頁 3611。

¹⁸ 南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即稱：「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關於梅堯臣詩歌創作的成就和文學史地位，參鞏本棟，〈北宋黨爭與梅堯臣詩歌的創作〉，載《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王水照等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29。

¹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282，冊 6，頁 3591。

慶曆前後，分別以范仲淹和呂夷簡爲首的統治階層內部的新舊兩派之間的鬥爭，其實質是變革圖新、強邦固本與寬忍優容、因循守舊這兩種不同的政風、士風之間的衝突和鬥爭。當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面臨社會、階級和民族矛盾逐漸激化的局面，亟欲起而興利除弊，緩和內外矛盾的時候，他們首先遇到的困難和障礙，並非來自某一個人的反對，而是這種因循保守的政風和士風。

在范仲淹、呂夷簡等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表面化的時候，梅堯臣不過是一知縣，且遠在建德，他並未也不可能直接參與到這一衝突中去。然而，早在梅堯臣任河南主簿之時，即與歐陽修、富弼、范仲淹、尹洙等人多有交往，作爲他們中的一員和詩友，梅堯臣在政治上是傾向於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一邊的，只不過這種傾向性主要是通過他的詩賦創作來加以表現的。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諫仁宗廢郭皇后被貶睦州，梅堯臣寫下了〈清池〉詩。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書抨擊呂夷簡而被貶饒州，梅堯臣又寫下了〈彼鷺吟〉、〈啄木〉和〈靈烏賦〉等作品，托物比興，對范寄予同情而對呂則頗爲不滿。及至慶曆革新失敗，范仲淹、富弼等相繼離京外任，蘇舜欽、王益柔等被貶斥，梅堯臣還作有〈雜興〉、〈送逐客王勝之不及遂至屠兒原〉、〈送蘇子美〉等，對諸人被貶深表同情。因此，梅堯臣在當時之難以爲舊派人物所用，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遺憾的是，梅堯臣也並不真正屬於以名節志氣相尚的新派人物中的一員，他在思想觀念上與范仲淹等人有著明顯的距離。

梅堯臣的父親梅讓終生未仕，從歐陽修爲其所撰墓誌銘來看，其思想是近於道家的。梅堯臣當受其一定影響。觀其所作〈傷白雞〉、〈和楊子聰會董尉家〉、〈靈烏賦〉等可證，尤其是〈靈烏賦〉，除了對范仲淹表示同情之外，又區分賢智，認爲烏雖靈而「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剝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鷺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²⁰。這都與

²⁰ 北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道家「行事尚賢」(《莊子》〈天道〉)和「安時而處順」(《莊子》〈養生主〉)的觀念相近。對梅堯臣的同情和勸慰，范仲淹自然不會不理解，但范與梅在思想上的不同也是顯而易見的。范仲淹自幼而孤，發憤苦讀，服膺儒術，倡為名節，史載「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²¹是符合實際的。范仲淹有和梅堯臣之作〈靈烏賦〉，其中寫道：「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略)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²²又作〈答梅聖俞〈靈烏賦〉詩〉曰：「危言遷謫向江湖，放意雲山道豈孤。忠信平生心自許，吉凶何恤賦靈烏。」²³其感物之意雖同，然起儒警頑，與原作殊途，殆無可疑。

梅堯臣的叔叔梅詢，與梅讓不同，是一位有文才辭辯而卜急好進的人物，在宋真宗朝即屢上書言西北邊事，宋仁宗時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梅堯臣自十二歲時就隨侍叔父，後又以梅詢之蔭出仕，思想亦不免受其影響。梅堯臣也喜歡論兵，並注《孫子兵法》十三篇，即為例證。²⁴然而，梅堯臣對《孫子兵法》的愛好，也與范仲淹異趣。其不為范仲淹所取，正如少喜談兵的張載之不被其所首肯，而要勸其去讀《中庸》一樣。²⁵事實上梅堯臣在注《孫子》中所表現出的才能，也並未得到朝廷的重視，雖然那時

年)，卷 6，頁 97。

²¹ 〈范仲淹傳〉，見元·脫脫等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314，頁 10268。

²²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 367，冊 9，頁 397。

²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169，冊 3，頁 1918。

²⁴ 梅堯臣注《孫子》，現部份保存在《十一家注孫子》(春秋·孫武著，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中。

²⁵ 參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冊 110，頁 182-185。

正是宋與西夏關係緊張，宋仁宗多次下詔命近臣舉方略材武之士和詔許有文武器幹者自陳的時候。

朋黨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一種很普遍而又很複雜的政治現象。在朋黨的觀念和認識上，梅堯臣與范仲淹等人也有差異。首先，范仲淹認為，倡為名節，以道義相許，以國事相合，是與結黨營私之行為，並無相似之處的，不應稱為朋黨。即使像歐陽修這位曾寫過〈朋黨論〉，力辨君子、小人之黨的革新派人物，實際上也很不願意被人指為朋黨。康定元年（1040），時任陝西安撫副使的范仲淹，欲聘歐陽修任節度掌書記，歐陽修拒絕了。拒絕的原因，就是避朋黨之名。歐陽修在給梅堯臣的信中說道：「親老，求官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掌箋奏，遂不去矣。」²⁶便道出了歐陽修真實的心理。當然，范仲淹等人既為崇尚名節、期冀革新的新風氣中人物，思想政治觀念較為一致，處事又較少避諱，因而在行迹上也就不免會授人以朋黨的口實。對此，范仲淹與歐陽修一樣，都不得以君子、小人之黨為辨。范仲淹曾為宋仁宗舉過一個例子，他說：「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²⁷其實這些話都是在被目為朋黨的不得已的情況下說的。

梅堯臣也認為友朋相交應以道義為重，但同時他又很反對「河濱捧土人，海畔逐臭夫」之類「同趣即爾徒」的做法。²⁸他認為「同趣」與「同道」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同趣」未必「同道」，而「同道」不必「同趣」，也就是「同道」不妨異論、異趣。梅堯臣與范仲淹、歐陽修等人都是早

²⁶ 北宋·歐陽修，〈與梅聖俞書〉，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 710，冊 17，頁 299。

²⁷ 南宋·李燾編，《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148，宋仁宗慶曆四年四月戊戌，冊 6，頁 3580。

²⁸ 北宋·梅堯臣著，〈異同〉，見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 14，頁 256。

年在西京洛陽就結識的朋友，但對他們在政治上自覺不自覺地保持著統一的步調，卻大有看法。梅堯臣在〈靈烏賦〉中雖對范仲淹表示支援和同情，但在賦的結尾卻說：「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²⁹是對歐陽修、尹洙、余靖諸人過激的行為不以為然。在〈靈烏後賦〉中，他更批評靈烏「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己不稱，昵己則譽」³⁰。直到晚年，梅堯臣也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在〈次韻答黃介夫七十韻〉中，他說：「鄙性實朴鈍，曾非傲公卿。昔隨衆人往，或值謗議騰。曰我非親舊，曰我非門生，又固非賢豪，安得知爾名？是時聞此言，舌直目且瞠。俄然我有答，賢相持權衡。喜士同周公，其德莫與京。」³¹始終認為范仲淹等人為朋黨，對自己的被排斥懷抱怨憤。從中可見梅堯臣與范仲淹等人的分歧的產生，主要地並非因為某一具體人事，而在於二者在思想觀念上存在著相當的差異。³²

梅堯臣既然在思想觀念上與范仲淹等人有分歧，那麼他們之間的矛盾遲早會表面化。寶元二年（1039）三月，宋與西夏關係緊張，范仲淹以韓琦薦知永興軍，未至改陝西都轉運使，七月又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上任後陸續薦用歐陽修（未應聘）、張方平、滕宗諒、許渤等人，卻不肯用曾注過《孫子》、又十分渴望從軍邊塞的梅堯臣（此即歐陽修所謂「關西幕府不能聘」），儘管歐陽修在〈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

²⁹ 北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 6，頁 96。

³⁰ 北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 15，頁 322。

³¹ 北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 28，頁 1017。

³² 梅堯臣的叔叔梅詢與呂夷簡關係較近。梅詢知濠州時，呂夷簡為通判，「詢待遇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之力也。」（見南宋·李燾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 124，仁宗寶元二年八月癸亥，冊 5，頁 2919）。梅詢與夏竦亦有舊。康定元年，夏竦任陝西經略安撫使，梅詢讓堯臣代書寄夏竦，以裴度比夏，表示了「願助畫」之心（北宋·梅堯臣著，〈寄永興招討夏太尉〉，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 11，頁 179）。而梅堯臣是以其叔叔的門蔭而出仕的，所以他也有被人懷疑為呂夷簡一派的可能。

辭辟命書》中也曾委婉地暗示，希望他能用一些像梅堯臣那樣「慷慨自重」的士人。³³於是，梅堯臣對范仲淹的不滿更明顯了。從其陸續所寫的〈桓妒妻〉、〈醉中留別永叔子履〉等詩中，我們可很容易地看出這一點。

總之，梅堯臣既不滿意呂夷簡等舊派人物的所作所為，也與范仲淹等新風氣中人物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有分歧，這種處於新舊兩黨夾縫之間的尷尬位置，決定了他既不能為舊派所用，也難以為新派所接納，其窮困不遇，實在是勢所必然的。

梅堯臣的窮困不遇既然主要是北宋黨爭影響的結果，歐陽修詩窮而後工之論又專為梅堯臣而發，則此論無疑是北宋黨爭背景下的產物。

參

詩窮而後工論自歐陽修明確提出來以後，便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確定下來，往後就是如何為人們所接受的問題了。

首先是對歐陽修的「梅堯臣論」的接受。比如王安石就在〈哭梅聖俞〉詩中對歐陽修的看法作了呼應。他寫道：「真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緯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公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適。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能收，空能乞錢助饋餽，疑此有物司諸幽。棲棲孔孟葬魯鄒，後始卓犖稱軻丘。聖賢與命相盾矛，勢欲強達誠無由。詩人況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為公侯。公窺窮厄以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³⁴既稱其詩，復憐其窮而歎其命，顯然受到歐陽修看法的影響

³³ 歐書中云：「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重。（略）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此在明哲，豈須獻言。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 697，冊 17，頁 51。）從中可略見范、歐、梅三人之間的關係。

³⁴ 北宋·王安石著，李壁注，《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影

。再像陳師道，他很喜歡梅堯臣的詩，論梅堯臣大致也贊同歐陽修的看法。他說：「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³⁵至清初，宋荦為重刻的《宛陵集》作序，對歐陽修的看法似乎又有進一步的理解，序曰：

宋梅聖俞先生工於詩，(略)世欲知先生之詩，讀歐陽公之文而可知也已。雖然，歐公謂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則學者不能無疑焉。《詩》三百篇，如武王、周公、成王、宣王、召康穆公、尹吉甫、衛武公之倫，其所賦詩皆目為古窮人之辭可乎？非窮人也，而遂疑其時有未工也而可乎？且「康哉」之歌，載於《虞書》，舜、臯陶豈窮而工者，乃曰「愈窮則愈工」。世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必且以《采薇》、《天保》、《清廟》、《閟宮》之作，謂反不如《桑柔》、《菴柳》、《北門》、《中穀》之感憤而悲涼，是歐公斯言滋之惑矣。何也？先生既系官於朝而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則非沈淪氓庶也。史稱西南夷布弓衣皆織其詩，名重於時如此，豈窮哉？然則，歐公奚以云？蓋嘗聞諸孔子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凡位不配德，任不展才，是皆所為不得志而窮焉者之事也。故歐公曰：「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而追商周之作者，豈不偉與。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也。」觀於是而歐公之言明，先生之意得矣。³⁶

對「窮」的含義理解更為通達。然而，無論是王安石、陳師道還是宋荦，當其討論梅堯臣的「窮」和「詩窮而後工」的命題時，都已有有意無意地離開了歐陽修發為此論的特定背景和原因。

印朝鮮活字本)，卷 13，頁 726-729。

³⁵ 見北宋·陳師道，〈王平甫文集後序〉，《後山集》，卷 11（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冊 1114，頁 615。

³⁶ 清·宋荦，〈宛陵文集序〉，見北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遂錄 14，頁 1173。

離開了問題討論的具體背景，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成了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文學批評，也成了勸慰政治上不得意之人的常用的措辭。比如王安石以詩答陸經，有謂：「高位紛紛誰得志，窮途往往始能文。」³⁷蘇軾贈詩釋仲殊，有曰：「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³⁸又曰：「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³⁹後來賀鑄也說：「詩豈窮人窮者工，斯言聞諸六一翁。」⁴⁰諸人所論雖也都有各自特定的原因，然審視問題的角度，無疑都與歐陽修相同，承繼了歐陽修的看法。以後大致也不例外，此無須贅述。⁴¹

離開了問題討論的具體條件和背景，也就會有人不贊同詩窮而後工之說。如，南宋周必大即以宋祁為例提出了這一問題。其〈跋宋景文公墨迹〉曰：「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詞章殆極其妙，後世益信窮人詩乃工之說。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路，而述懷感事之作徑逼子厚。贈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緯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窮論也。」⁴²葛勝仲亦舉陳與義為例，以為此說不可據。⁴³清人袁枚承前人之說在〈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中寫道：「詩始於臯夔，繼以周召，而大暢於尹吉甫、魯奚斯諸人。此數人者，皆詩之至工者也，然而皆顯者也。自君子道消，

³⁷ 北宋·王安石著，〈次韻子履遠寄之作〉，李壁注，《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 35，頁 1590。

³⁸ 北宋·蘇軾著，〈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一，見王文誥編注集成，孔凡禮校點，《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33，冊 6，頁 1750。

³⁹ 北宋·蘇軾著，〈僧惠勤初罷僧職〉，王文誥編注集成，孔凡禮校點，《蘇軾詩集》，卷 12，頁 577。

⁴⁰ 北宋·賀鑄，〈題詩卷後〉，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1110，冊 19，頁 12594。

⁴¹ 即如宋人劉摯，〈文瑩師集序〉，《忠肅集》，卷 10；李之儀，〈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姑溪居士後集》，卷 15；李綱，〈五峰居士文集序〉，《梁溪集》，卷 138；程秘，〈曹少監詩序〉，《洺水集》，卷 8 等等。

⁴² 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卷 16，冊 1147，頁 148。

⁴³ 參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 3071，冊 142，頁 343-344。

乃有〈考槃〉、〈衡門〉諸作，毋乃窮而後工之說，其亦衰世之言乎？」⁴⁴從世道盛衰立論，認為詩窮而後工說並不周全。錢大昕〈李南澗詩集序〉亦云：「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自然。金石絲竹匏土草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鳥何不平於春，蟲何不平於秋，世之悻悻然怒、戚戚然憂者，未必其能鳴也。歐陽子之言曰：『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導八驕，而稱放廢；家累巨萬，而歎窶貧，舍己之富貴不言，翻托於窮者之詞，無論不工，雖工奚益！」⁴⁵則對韓愈和歐陽修的觀點都不贊成，而以為詩乃出於天性自然，志趣所之、不得不發為工。離開了討論的特定背景和語境，問題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

清初的吳兆騫還曾以自己的不幸遭遇為例，反對詩窮而後工說。其曰：「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窮而後工，仆謂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窮也。彼所謂窮，特假借為辭，如孟襄陽之不遇，杜少陵之播遷已爾；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爾；至若蔡中郎髡鉗朔塞，李供奉長流夜郎，此又古人困厄之尤者。然以仆視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九州之內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闊矣。同在覆載之中，而邈焉如隔夜泉，未知古人年此當復云何。以此知文莫工於古人，而窮莫甚於仆；惟其工，故不窮而能言窮，故當工而不能工也。萬里冰天，極目慘沮，無輿圖記載以發其懷，無花鳥亭榭以寄其興，直以幽憂惋鬱無可告語，退托筆墨以自陳寫，然遷謫日久，失其天性，雖積有篇什，亦已潦倒潰亂，不知其所云矣。《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夫知其當已而不能自己於吟者，此仆此日之心也。」⁴⁶這些話當可以理解，因為吳兆騫曾以順治十四年科場案被謫戍漠北

⁴⁴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增修本），卷10，頁102。

⁴⁵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十一年刻本），卷26，冊1438，頁681。

⁴⁶ 清·吳兆騫，〈與徐健庵書〉，《秋笏集》，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

甯古塔二十三年，其內心的憤懣哀苦可想而知。這是一個特例。然而他在這裏也說出了另一個道理，即窮困不遇也應有限度，否則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淵明所以能作詩是因為他還有酒喝，假如他真得餓昏了，恐怕也無此雅興的。⁴⁷

詩是如此，或以為詞則不然。比如朱彝尊〈紫雲詞序〉曰：「昌黎子曰：『歡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於詞，或不然。大都歡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⁴⁸從詞的音樂屬性來看，自有其道理。不過，同樣有不同的意見。像吳錫麒就說：「昔歐陽公序聖俞詩，謂窮而後工，而吾謂唯詞尤甚。蓋其蕭寥孤奇之旨，幽夤獨造之音，必與塵事罕交，冷趣相洽，而後托么弦而徐引，激寒吹以自鳴，天籟一通，奇弄乃發。若夫大酒肥魚之社，眼花耳熱之娛，又豈能習其鏗鏘，諧諸節奏？」⁴⁹這可以說是詩窮而後工說在詞學中的運用。⁵⁰

窮達與文學創作的題材和主題的選擇與工拙究竟有無必然的聯繫？怨憤譏刺、悲愁淒婉的作品是否一定比歌功頌德之作更易於成功？當然是可以討論的。在我們今天看來，逆境往往可以使作者更為客觀地面對現實，更真實地反映現實和抒寫自己的心靈，更專力於詩文的創作，因而往往

修四庫全書》影印雍正四年吳振臣刻本），冊 1412，頁 222。

⁴⁷ 尚有反對詩窮而後工說，而又贊同詩能窮人說者，如袁宏道〈謝於楚歷由草序〉中所論。見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 35，頁 1112-1113。

⁴⁸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 40（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冊 1318，頁 106。

⁴⁹ 清·吳錫麒，〈張淥卿露華詞序〉，《有正味齋駢體文集》，卷 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十三年刻本），冊 1459，頁 664。

⁵⁰ 後世還有人認為畫也是窮而後工的，參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屠友祥校注本，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卷 2「題畫贈朱敬輅」條，頁 148。

能寫出更好的作品，但是，在窮達與工拙之間，並無必然的聯繫，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決定作品的好壞和工拙的，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窮達與工拙的關係既不易講清，就又有跳出窮達與詩文工拙的關係來立論的。如張耒就不同意「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詞」的做法，他認為：「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惑，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系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蟲，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⁵¹不以文人自命，也不贊成一味作窮人之詞，可謂議論正大。然離開我們的論題已較遠了。

坎坷興怨，發憤著書，窮而後工；然或出於同情、或聊以自慰、或借他人之酒自澆塊壘，遂又有「詩窮而後工」的逆命題：人以詩而窮。如蘇軾即謂：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鐻，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⁵²

這裏無疑有為朋友鳴不平的緣故，然兼融儒道，識見較為通達，自可見蘇軾思想的本色。

⁵¹ 北宋·張耒，〈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張耒集》，卷 48（李逸安等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下冊，頁 753。

⁵² 北宋·蘇軾著，〈邵茂誠詩集敘〉，孔凡禮校點，《蘇軾文集》，卷 10，頁 320。

受蘇軾的影響，其弟子也多持此說。如晁補之認為：「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略)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此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鹹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鬪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⁵³詩文不足以發身，其實也就是人以詩而窮的意思。後來賀鑄云：「端慚少作老更拙，不廢汝詩吾固窮。」⁵⁴「詩解窮人未必工，苦調酸聲效梁父。」⁵⁵另，朱熹亦云：「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略)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⁵⁶其意皆同。至於明人王世貞承前人之說，衍為「文章九命」⁵⁷，更是把詩能窮人的看法誇張到了極點，未免偏頗。

「詩能窮人」也有其反命題，即「詩能達人」。例如，陳師道在〈王平甫文集後序〉中，由梅堯臣論及王安國，發了如下一番議論：

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群下士，歷年未幾，複解章紱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

⁵³ 北宋·晁補之，〈海陵集序〉，《雞肋集》，卷 34，(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冊 1118，頁 662-663。

⁵⁴ 北宋·賀鑄，〈題詩卷後〉，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1110，冊 19，頁 12594。

⁵⁵ 北宋·賀鑄，〈留別僧訥〉，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卷 1102，冊 19，頁 12502。

⁵⁶ 南宋·朱熹著，〈答徐載叔〉二首其一，見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卷 56，頁 2825。案周必大的看法與朱熹不同，他在〈跋陸務觀送其子龍赴吉州司理詩〉中說：「吾友陸務觀，得李杜之文章，居嚴徐之侍從，子孫衆多如王謝，壽考康寧如松喬。詩能窮人之謗，一洗萬古而空之。」(南宋·周必大，《文忠集》，卷 51，頁 543) 視角不同，結論也不一樣。

⁵⁷ 所謂文章九命，即：「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參明·王世貞，《藝苑卮言》(羅仲鼎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 年)，卷 8，頁 389。

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⁵⁸

陳師道並不反對詩窮而後工，也不反對詩能窮人，然換從「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角度思考，此時之窮，又何嘗不是彼時之達，故謂詩亦能達人。這固然是曠達之論，然個中的哀怨無奈也是顯而易見的。

有意思的是，受中國古代士人的影響，詩窮而後工說在域外也頗為詩人們所關注。例如朝鮮士人就對此進行過爭論。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尚能注意到詩窮而後工說是歐陽修有為而發的，然而他們又多不贊同詩窮而後工說。因為在其看來，歐陽修之說既是有激而云，則無論是「窮者而後工」還是其逆命題「詩能窮人」等，就都不夠妥當。如車天輅認為，詩之「工拙，才也；窮達，命也。才者在我，而工拙之分天也；命之在天，而窮達之數，夫豈人力也哉？」所以，「工者自工，拙者自拙，窮者自窮，達者自達」。⁵⁹李德壽也認為「詩之工不工，系乎才，不系乎位，豈必窮之盡才，而通之盡不才乎？」故「非天之窮其詩也，窮其才也；非窮乎古也，窮乎今也。」⁶⁰與中國古代士人的不同在於，他們認為詩的工拙更多地是與人的才能大小密切相關的，而窮達則無與於詩。至於金錫胄、張維等人以為，文章既為不朽之盛事，那麼達者之達，不過「達於一時，其窮也窮

⁵⁸ 北宋·陳師道，〈王平甫文集後序〉，《後山集》，卷 11，《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冊 1114，頁 615。

⁵⁹ 車天輅，〈詩能窮人辨〉，《五山集》，卷 5，見《韓國文集叢刊》冊 61（首爾：景仁文化社，1991 年），頁 433。

⁶⁰ 李德壽，〈詩能窮人辨〉，《西堂私載》，卷 4，見《韓國文集叢刊》冊 189（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 年），頁 264。

於萬世；此之窮，窮於一時，其達也達於萬世」。⁶¹「若其所傳乎遠者，怨仇不敢議其短，君相不能奪其譽，掩之而愈彰，磨之而益光，殘膏剩馥，足以沾丐百代。」⁶²則又與陳師道一致了。

總之，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某種文學理論和觀點的提出，當然有文學自身發展的原因，但往往也有其產生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和背景。離開了這些條件和背景，我們恐怕不但不易理解某種理論提出的真正原因，也難以完全把握它的內涵。「詩窮而後工」說適為其一例而已。

⁶¹ 金錫胄，〈詩能窮人辨〉，《息庵先生別稿》，卷上，見《韓國文集叢刊》冊 145（首爾：景仁文化社，1995 年），頁 559。

⁶² 張維，〈詩能窮人辨〉，《溪谷集》，卷 3，見《韓國文集叢刊》冊 92（首爾：景仁文化社，1994 年），頁 63。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春秋·孫武著，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南朝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宋·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李燾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宋·王安石著，南宋·李壁注，《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朝鮮活字本。
- 宋·蘇軾著，孔凡禮校點，《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編注集成，孔凡禮校點，《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宋·陳師道，《後山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 宋·張耒著，李逸安等校點，《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宋·晁補之，《雞肋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 宋·劉摯，《忠肅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後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

》影印文淵閣本。

宋·李綱，《梁溪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宋·程秘，《洺水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宋·周必大，《文忠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元·脫脫等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十一年刻本。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清·吳兆騫，《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雍正四年吳振臣刻本。

清·吳錫麒，《有正味齋駢體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十三年刻本。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增修本。

清·董其昌著，屠友祥校注，《畫禪室隨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

朝鮮·車天輅，《五山集》，《韓國文集叢刊》冊61，首爾：景仁文化社，1991年。

朝鮮·李德壽，《西堂私載》，《韓國文集叢刊》冊189，首爾：景仁文化

社，1997年。

朝鮮·金錫胄，《息庵先生別稿》，《韓國文集叢刊》冊 145，首爾：景仁文化社，1995年。

朝鮮·張維，《溪穀集》，《韓國文集叢刊》冊 92，首爾：景仁文化社，1994年。

（二）近人編輯、論著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張健，《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5年。

張健，《歐陽修之詩文及文學評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

鞏本棟，《北宋黨爭與梅堯臣詩歌的創作》，載《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王水照等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